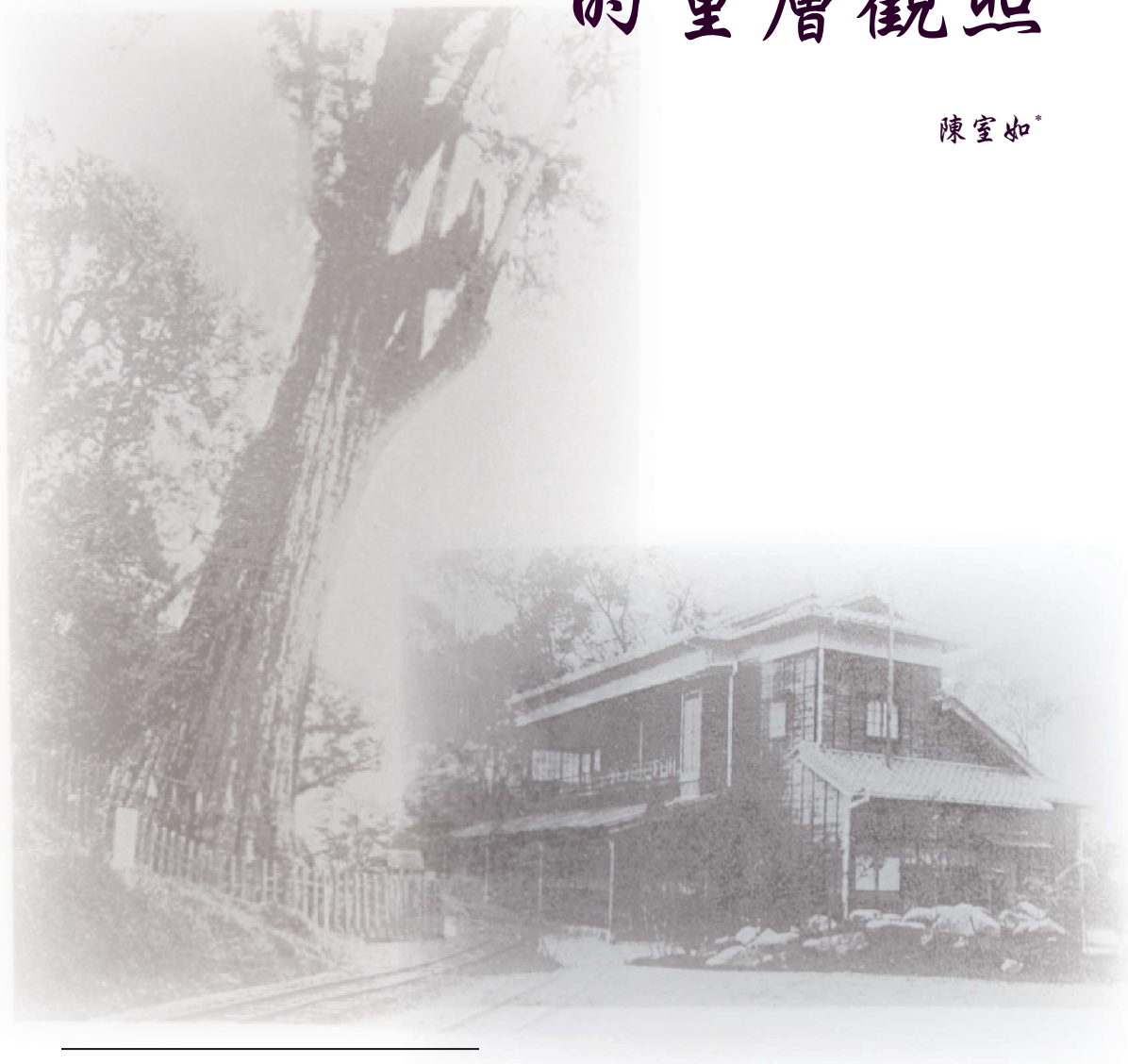


對鏡隱喻

— 日治時期臺灣遊記 的重層觀照

陳室如*



* 陳室如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所指之臺灣遊記以日治時期中國旅人所書寫之作品為主，不包含臺灣作者如吳德功等人所作之臺灣遊記。日治時期的臺灣被割離中國版圖，成為另一個域外空間。在跨越新國界的過程中，由於時空背景的特殊性，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呈現出獨特的文化意涵。在日本政府的經營下，臺灣已由以往的邊陲荒島轉變為中國所欲努力學習的借鏡對象。

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呈現出多元的重層觀照，在對比的反射中，旅人們更清楚窺見自我與本土（中國）；在陌生異地尋找熟悉景象的聯想，這些遊記作品交織出複雜的內在觀照。

「中心／邊陲」的參照模式以及民族意識的摻雜，使這些遊記在詮釋中國／臺灣的關係時，有著更深層的對鏡隱喻。除了珍貴的史料價值外，也更真實地反映出臺灣／中國長久以來糾結難解的情感。

【關鍵詞】：日治、黃強、鏡像、江亢虎、臺灣遊記



一、前言——邊陲／域外

道徑塵肆，廣不盈丈，豕豕當門，臭惡交炆燭。市人無老稚男婦，率面色顛頰，血不足肉，而貪著綺紈，坐起皆嚼生檳榔不去口，搖脣露齒，猩紅駭人。¹

余自旅行臺灣回，友人每令余述其所見。余欲詳言之則不能、欲簡言之又不可，輒應曰：『交通便利、實業發達、教育普及以及公益畢舉而已』。²

引文一摘自蔣師轍《台游日記》中參觀台南延平王廟的記錄，日期為清光緒18年（西元1892年）4月12日；引文二則為劉範徵於1915年12月4日隨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至臺灣考察的遊歷心得。蔣師轍所接觸的臺灣以一種落後、髒亂的異文化形象存在於其遊記中，然而，20多年後，歷經日本將近20年的經營，再次呈現於中國人遊記中的臺灣圖象，卻已是「交通便利、實業發達、教育普及、公益畢舉」，成為進步與現代化的表徵。相隔20年，在不同的領導者統治經營下，兩位旅人所見識到的景象卻已截然不同。

根據廈門海關檔案資料編制的《1895年－1940年廈門口岸出入臺灣人數統計表》顯示，日治時期的兩岸交流其實極為頻繁，³這段期間，不論是基於官方考察名義參觀、抑或私人旅行、生意往來……等諸多不同的旅行動機，由中國大陸前往臺灣的旅行人數並不在少數。這些旅人所留下的遊記作品，除了保留珍貴史料外，當他們踏上這塊昔日曾為共同疆土、今日卻已被劃歸為異國的土地時，所呈現的觀看角度與內

1 蔣師轍：《臺灣文獻叢刊第六種·台游日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頁18。

2 劉範徵：〈臺灣旅行記（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一種·臺灣旅行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頁80。

3 1895年－1940年間，從廈門口岸出、入臺灣的人數，最少為每年2598人到4295人，最多達每年22572人到26183人，年均出、入臺灣人數為7221.7人到9396.9人。轉引自汪毅夫：〈日據時期的閩台關係〉，《瞭望新聞周刊》15期（2005年4月11日），頁39。

在省思，更為日治時期的旅行書寫提供了不同的觀照層面。

旅行地點與政治版圖的特殊性，使得日治時期中國人的臺灣旅行書寫呈現另一種耐人尋味的解讀空間。割讓後的統治權轉移，臺灣被劃歸為中國「域外」的事實自然無庸置疑，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文化與民族的淵源，卻又使得此一「域外」定義摻雜了更多不確定的空隙。

再者，日治時期的中國旅人，不再以宦遊身分前來臺灣，歷經日本統治後，臺灣的進步現況，反而成為當時中國所欲考察與學習現代化的對象。由落後的邊陲角落到象徵先進的模仿典範，日治時期中國人的臺灣遊記早已顛覆了先前清治時期旅台官員所留下刻板印象，充滿更豐富多元的文化意涵。

然而，儘管日治時期由中國人所書寫的臺灣遊記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長久以來，卻一直未曾受到對等的重視，成為日治時期文學研究領域中極為荒蕪的一塊角落。除汪毅夫〈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⁴一文曾對汪洋、黃強、江亢虎三人的臺灣遊記有簡略的概要評析外，應屬翁聖峰〈江亢虎遊台爭議與《台游追記》書寫〉一文⁵有較為深入的論述。但汪毅夫之文偏於簡單扼要的資料整理，且範圍太過狹隘；翁聖峰之文又偏重於江亢虎遊記中關於白話與文言論爭的析論，對遊記本身的探討反而有所不足。截至目前為止，以日治時期中國作者所書寫的臺灣遊記為主的相关研究，迄今仍缺乏弘觀的整體論述，頗為可惜。

法國著名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岡（Jacques Lacan）以嬰兒對鏡時通過「鏡象」而產生對自我的完整感，揭示「自我」形成的想像性和虛構性，「識別」與「誤識」重疊，形成一個認同與抗拒兼而有之的主體

4 汪毅夫：〈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臺灣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2000年2月，頁78-82、91。

5 翁聖峰：〈江亢虎遊台爭議與《台游追記》書寫〉，《台北師院語文集刊》9期（2004年11月），頁31-54。



性建構歷程，⁶

細讀日治時期所留下的臺灣遊記，不難發現，不論是官方考察的報告文字、或者個人抒發情感的心得記錄，都可以看到這些中國旅人們在旅行途中不斷以臺灣為借鏡，藉由對鏡過程，從他者（台灣）身上映照出另一個更真實的自我與本土（中國）。這些旅行文本，與其說是純粹的異地見聞，不如說是更為複雜的對鏡記錄。

本文擬以此為研究焦點，首先就文本資料進行蒐羅與整理，對日治時期臺灣旅行書寫的創作及出版概況有一基本認識；其次，再針對遊記中旅人們所呈現的對鏡歷程與自我省思作進一步的分析探討，藉由遊記中的對比映照與角度轉換，對日治時期中國旅人之臺灣遊記所呈顯的多重觀照有更為深入的瞭解。

二、日治時期中國旅人之臺灣遊記書寫概況

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首先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之《臺灣文獻叢刊》⁷收錄最豐，計有施景琛《鯤瀛日記》、張遵旭《臺灣遊記》、邱文鸞等三人合著之《臺灣旅行記》三種。

其次，中國官方相關考察報告中，亦附有相關遊記作品，例如汪洋《台游日記》（附於汪洋所著《臺灣觀察報告書》中）、鄒兆琨《考察日記》（附於李時霖所著之《臺灣考察報告》），這些遊記作品，作者除記錄公文檔案外，亦抒發個人所思所感。

筆者再進一步查詢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台大圖書館

6 梁儂剛：《回歸佛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年），頁97 - 123。

7 周憲文主持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時，曾匯集眾人之力量編成《臺灣文獻叢刊》，自民國46年—61年間，陸續出版此一叢刊至309種、595冊，收錄臺灣文化史之相關珍貴文本。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史料叢刊309種提要》（台北：臺灣銀行，1977年），頁2。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目前已將「臺灣方志」、「臺灣檔案」、「臺灣文獻」全文輸入「漢籍資料庫」中，全文檢索網址為<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2006/09/17，available）。

館藏資料後，查得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與江亢虎《臺游追記》、江庸《臺灣半月記》三部私人著作以及佛教界人士太虛大師所留下的《東瀛采真錄》一書。

此九部作品，應為目前臺灣所見之較完整文本資料。以下即以寫作年代先後為序，分述此九部作品之概要資料：

《鯤瀛日記》⁸為施景琛於壬子年正月初三日（西元1912年2月20日）奉閩浙總督松鶴之命渡臺調查實業所作，作者於正月初九日（2月26日）乘大仁丸渡臺灣海峽，次日抵臺北，11日開始考察工作，之後於正月29日（3月17日）乘大仁丸離臺返閩，《鯤瀛日記》即記此段期間之行程與考察所得。

《臺灣旅行記》⁹為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學生所作之三篇臺灣遊記。1915年12月4日，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校長何纘率各級學生旅行臺灣，之後於1916年5月致贈省立臺北圖書館《臺灣修學旅行報告書》一書，書中附錄邱文鸞、劉範徵、謝鳴珂等三名學生所作之〈臺灣旅行記〉三篇。

汪洋〈台游日記〉收於《臺灣觀察報告書》¹⁰中，與張遵旭《臺灣遊記》¹¹之旅行背景同為奉福建巡按使委任，赴臺灣參觀勸業共進會開會，為同團旅伴。¹²二書分別記錄兩人於1916年4月3日－4月20日之訪台經過。

8 本文所採用版本為省立台北圖書館所藏之鉛印本，與池志徵《全台遊記》、吳德功《觀光日記》、張遵旭《臺灣遊記》等作品一同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九種·臺灣遊記》（台北：臺灣銀行，1960年，初版）。

9 本文所採用版本為省立台北圖書館所藏之油印本，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一種·臺灣旅行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10 汪毅夫記載廈門集美圖書館收錄有該書上海中華書局1917年6月版，參見汪毅夫：〈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頁78。本文所採用版本為汪洋：《台灣觀察報告書》（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台一版）。

11 本文所採用版本為省立台北圖書館所藏之油印本，與池志徵《全台遊記》、吳德功《觀光日記》、張遵旭《臺灣遊記》等作品一同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九種·臺灣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12 張遵旭此行與汪洋同行，皆以奉福建省長所派代表名義赴台，《臺灣遊記》中即記載：「轉達汪君子實，決定今日束裝起身赴台；……十一時許，同汪君乘馬車到將軍署告辭。」文中所言之汪君，即為汪洋。參見張遵旭：《臺灣遊記》，頁69。



《東瀛采真錄》¹³的作者太虛大師於1917年應臺灣凌雲禪寺、靈泉寺之住持善慧、本圓大師之邀，前往位於基隆月眉山的靈泉寺主持水陸法會並弘法布教。¹⁴此書記述太虛大師於臺灣及日本的旅行經驗，收錄作者與友人唱和的多首詩作。太虛大師於臺灣停留期間，也至嘉義義德佛堂、彰化曇華佛堂、和美柑子井善德佛堂、臺中慎齋堂等地演講弘法外，並與當時文人如連雅堂、洪棄生、林獻堂……等有所交流。彰化曇華佛堂今仍懸掛太虛大師所題「宏法利生」四字之匾額。¹⁵（圖一）



【圖一】：太虛大師於彰化曇華佛堂所題之匾額

- 13 唯心太虛：《東瀛采真錄》（雞籠：月眉山靈泉寺，大正7年（1918），初版）。太虛大師返國後，集東遊之詩文、遊記，編《東瀛采真錄》一書，於大正7年（1918年），以徒弟乘戒去臺灣中學林肄業之便，攜去由靈泉寺印行。參見印順導師：《太虛大師年譜》（台北：正聞出版社，5版），頁95。本文所採用版本為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之微捲資料，根據筆者查詢結果，目前臺灣僅有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收錄該書，因紙本資料過於老舊，僅提供微捲資料供查詢使用。資料庫所顯示之書名為《東瀛采真集》，但調閱微捲資料後，發現書名實為《東瀛采真錄》。
- 14 靈泉寺因慶祝新建的三塔（即開山堂、報恩塔、普同塔）落成，而舉行水陸法會，善慧大師原擬邀請圓瑛大師來台，但圓瑛大師有事不克前往，乃介紹剛結束閉關的太虛（2月4日出關）東行。又因太虛大師久思去日本，一覘佛教與歐學調劑之方。因此太虛來臺的條件，是要善慧師以事畢陪他赴日本一遊，以此因緣，決定了太虛東遊臺灣、日本之議。參見釋慧嚴：〈太虛、圓瑛二大師與臺灣佛教界〉，《中華佛學學報》17期（2004年7月），頁216 - 219。
- 15 曇華佛堂位於彰化市大同里永樂街44巷6號。

《臺灣別府鴻雪錄》的作者黃強本名黃莫京，曾任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赴台旅行之年，《臺灣別府鴻雪錄》失記，但根據汪毅夫考證推斷，應為1927年，¹⁶具體日程則於11月30日從廈門登舟赴台，12月1日抵達基隆，在台居留10多日（離台日期，書中失記）。黃強自述其旅遊動機為「徘徊往蹟，增益見聞」，¹⁷《臺灣別府鴻雪錄》乃於1928年5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發行。¹⁸

《臺灣半月記》的作者江庸於1929年「受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之託，遄赴臺灣，募集捐款，以拯西北災黎」，自11月13日抵達臺灣，同月28日返回中國，共停留16日，曾造訪基隆、臺北、阿里山、日月潭、彰化、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地，遊記內容主要記載「臺灣特殊之制度、重要之事業，以迄山川風土」。¹⁹據筆者查詢結果，該書目前只有台大圖書館館藏殘本（僅收錄至32頁），且出版地、出版者均不詳。（圖二）



【圖二】：涵碧樓(江庸：《臺灣半月記》，未標明頁數)

- 16 汪毅夫提及《臺灣別府鴻雪錄》所用統計資料時間上的下限為大正十四年底，即1925年底，書出版於1928年5月，而書中記事自11月始，則其年當在1926—1927年間，書中謂：「文庚先生約往廈門大學，余以前曾參觀兩次，……婉辭之」，而《廈大周刊》1926年12月1日有文記黃莫京11月中旬參觀廈大事，據此可推斷黃強此行約在1927年。參見汪毅夫：〈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頁91。
- 17 黃強曾在文中提到其前往臺灣旅遊動機為「徘徊往蹟，增益見聞。」參見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28年），頁1。
- 18 本文所採用版本為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之微捲資料，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初版），根據筆者查詢結果，目前臺灣僅有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收錄該書，但因紙本資料過於老舊，僅提供微捲資料供查詢使用。
- 19 江庸：《臺灣半月記》（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29年），頁1。



《臺游追記》²⁰為作者江亢虎²¹於1934年8月21日至9月12日之間，以「在野學者」身分至臺灣遊歷，作者自言：「余亦以足跡幾徧天下，而生平未抵此歷史上一名島，亟欲一觀野番初民生活，和蘭殖民遺規，延平王開拓之功，清政府經營之迹，及四十年日本化之現狀，於是台游之念以決。」²²，可見此趟旅行應為私人參訪。《臺游追記》出版前曾於上海《晨報》連載，該書於1935年9月由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考察日記〉為鄒兆琨於1936年12月1日至14日隨同當時的廈門市長李時霖、福清縣長毛應章等一行十一人，由福建省政府派往臺灣考察之日記，附錄於李時霖總編之《臺灣考察報告》一書中。²³

綜合以上所述資料，茲將日治時期中國旅人所書寫的臺灣遊記資料整理出以下表格：

-
- 20 汪毅夫：〈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一文中稱此書為《臺灣追記》，但根據筆者在臺灣大學圖書館所影印之文本資料為江亢虎：《台游追記》（上海：中文書局，1935年，初版），出版商、出版地點、出版日期……等均與汪毅夫所言一致，但書名卻有所不同，且查詢汪曾於文中所言之資料來源為「廈門集美圖書館」（<http://www.jmlib.cn/>），亦未查得有關《臺灣追記》館藏資料，汪毅夫所云江亢虎著《臺灣追記》一書，應為誤植。
- 21 江亢虎（1883－1954）原名紹銓，江西上饒人，曾於1911年、1924年兩度組織中國社會黨（《臺游追記》有「社會黨同志」之語），又曾於1922年創辦上海南方大學並自任校長，抗戰期間出任汪精衛偽國府委員和考試院院長，抗日戰爭勝利後以漢奸罪名被捕，1954年病死獄中。
- 22 江亢虎：《台游追記》（上海：中文書局，1935年），頁2。
- 23 李時霖：《臺灣考察報告》（廈門：廈門市政府，1937年），收錄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第八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

【日治時期中國旅人之臺灣遊記書寫概況】

	作者	書名	旅行動機	旅行時間	出版時間
1	施景琛	《鯤瀛日記》	官方考察	1911/2/28—3/17 (18日)	
2	邱文鸞、 劉範微、 謝鳴珂	《臺灣旅行記》	修學旅行	1915/12/4—12/15 (12日)	
3	汪洋	〈台游日記〉	參觀勸業共進會、開會	1916/4/3—4/20 (18日)	1917/6
4	張遵旭	《臺灣遊記》	參觀臺灣勸業會	1916/4/3—4/20 (18日)	
5	太虛大師	《東瀛采真錄》	主持水陸法會、弘法	1917/10/19—1917/12/2 (45日)	1918/1
6	黃強	《臺灣別府鴻雪錄》	增益見聞	1927/12/1—(約10多日)	1928/5
7	江庸	《臺灣半月記》	募款賑災	1929/11/13—28 (16日)	1929
8	江亢虎	《臺游追記》	私人參訪	1934/8/21—9/12 (23日)	1935/9
9	鄒兆琨	〈考察日記〉	官方考察	1936/12/1—14 (14日)	1937/6

從上述表格資料中，可以發現幾個特點，首先就旅行動機而言，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書寫背景，以參訪考察居多。施景琛、汪洋、張遵旭、鄒兆琨等人的出遊動機皆與福建政府有關，邱文鸞等三人的修學旅行雖是以學生身分出遊，但旅行重點仍在考察臺灣各項實業機構，藉此學習。以私人動機出遊者，有太虛大師、黃強、江庸、江亢虎等四人，太虛大師的宗教之旅有任務在身，所接觸對象也多為宗教界人士，江庸有募款的實際需求，黃強、江亢虎則純為個人興趣，這些旅人與官方考察的關注層面自然有所不同，不再只以經濟層面的物質表象為主，而更深入探討當時臺灣社會文化所呈現的其他問題。

其次，就停留天數來看，除太虛大師停留時間為45日外，其他中國旅人的停留天數多半為10多日，最長僅達23日，在未滿一個月的旅行時間裡，為配合緊湊的行程安排、發揮最大時間效率，其旅行方式多半



僅止於走馬看花的浮光掠影式遊覽。如何於短暫的停留時間內，跳脫一再重複的現代化讚嘆，進一步參照出自我與他者的內在反思，也考驗著這些中國旅人的文化素養。

由出版形式來看，除以私人因素旅遊而出版的個人遊記作品外，其他以官方參訪為主要目的的遊記，往往極易被讀者歸類於公文報告檔案，而忽略其中所蘊含的文化意涵。除去客觀統計資料後，這些詳細描述旅行過程的札記內容，看來雖瑣碎繁雜，卻反而更真實反映出旅人與他者的內在互動。法叟即認為記憶是開啟旅行書寫之鑰，他將旅行文學賦予理論基礎，認為旅行文學是一種混合錯雜的形式，綜攝許多不同文類鎔鑄為一，內容雖雜亂混淆，卻一直都是作家愛不忍釋的書寫形式。²⁴這些附錄於各式參觀報告書中的臺灣遊記，正具備此種複雜性與多元性，因此，雖以附屬地位存在，其獨立價值卻更不容忽視。

再就書寫形式來看，可以發現，這些作者們不約而同皆採用日記體的書寫模式。日記體與旅行書寫之間有其獨特關連存在：

旅行書寫記錄旅行者心智的成長，同時也呈現他的內在欲求和恐懼，日記體由第一人稱的「我」來鋪陳敘述，也令作者得以從容建構敘述。²⁵

在客觀描述與自我耙梳的交互對映中，日治時期中國旅人所選擇的書寫方式，也在觀看與被觀看的過程裡，更完整地建構出旅人的主體性。

三、重層鏡像——熟悉／陌生他者的自我觀照

24 法叟提到：「旅行書寫包括私人日記、散文、短篇故事、散文詩、未經琢磨的摘錄，或是進餐時主人殷勤有加，待客雅興的閒談，旅行書寫自由地混雜敘述和話語的寫作。許多「事實」資料，諸如帳單、菜單、票根、名姓與地址，日期與目的地，皆存留其間。」轉引自陳長房：〈建構東方與追尋主體——論當代英美旅行文學〉，《中外文學》26卷4期（1997年9月），頁33。

25 宋美瑾：〈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族建構——論狄福、菲爾定和包士威爾的旅行書〉，《中外文學》26卷4期（1997年9月），頁21。

以臺灣作為借鏡，對於日治時期的中國人而言，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普遍的概念：

今歲為閩省之經濟建設年。此後施政中心，實以經濟建設為先務，惟茲事體大，不有借鏡，難期推行盡利。臺灣與閩帶水相望，不特氣候地理同也，即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如農林水利交通衛生諸端，亦復什九相似，取彼成規，供我參考，其收事半功倍之效。²⁶

民國26年，任閩省政府主席的陳儀便於李時霖的《觀察報告書》中題此為序。由於福建與臺灣擁有類似的地理條件，再加上地緣便利，在日本政府經營之下經濟進步的臺灣，頓時成為對岸中國人所爭相效法學習的對象。

著名的中國外交家顧維鈞在同一份報告書前亦以「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為題詞，希望中國能由臺灣的成功經驗中學習。

日治時期中國人的臺灣定位，已由以往落後的邊陲搖身一變為被斷然割裂的借鏡對象。在對鏡過程裡，這些中國旅人們也在遊記作品中反射出一個不同於往的中國圖象。

（一）轉折的現代性體驗

日治時期中國旅人在面對臺灣各層面的進步成長時，在驚訝讚嘆之餘，²⁷也不免屢屢以此為對鏡，在他者（台灣）身上重新看見本土（中國）的真正形象：

吾觀我國天然林野之區，而林學不修、林業不興；不特海防無

26 陳儀：《臺灣考察報告·陳主席序》（廈門：廈門市政府，1937年），頁390。

27 在日治時期中國人的臺灣遊記作品中，處處可見其對臺灣現代化的描述與讚嘆：「台北街，整齊宏潔，洵為臺灣首善之區」、「本日參觀所經各地，均係偏僻之鄉，但經日人積極之經營，電燈電話自來水，無不普及，駸駸乎與西洋並駕齊驅，觀此可知臺灣建設之一班矣」「台北全市人口不過二十六萬餘，而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臺灣同化之速，可驚亦可歎也。」參見太虛大師：《東瀛采真錄》，頁37、鄒兆琨：〈考察日記〉，頁551與江亢虎：《台游追記》，頁15。



是，即內地邱陵連疊，亦皆童山濯濯，莫之圖謀。用是水旱頻仍，饑饉薦臻，民安得不為盜賊、國安得不貧弱哉！興言及此，殊堪浩嘆！吾又觀打狗之造林，學士通人悉心研究以補國家官吏之不足，必達其初志而後止。彼能之，我何為不能！乃造林不若是之困難者，未聞經營其事之人，吾儕赧顏無地也！²⁸

臺灣之實業會社 日本人民之投資極著信用，故其株式會社亦極發達。如製糖、製酒、製茶、製瓦斯、製木材、製水產等項，皆集會社、用機器為之。計全臺百萬以上之會社，殆四、五十所；其出產之富，可想見矣。然其人民投資之信用，蓋由企業者之熱心會社能使事業擴張而收其實效也。惟吾國則否，嘗藉會社之名而為個人斂財之地，至事業成敗，置之不理。甚至旋起旋滅，空投巨資於烏有。此吾國民之所以無投資信用，亦實業不能發達之一大原因也。悲夫！²⁹

謝鳴珂在比較臺灣與大陸在林木保育方面的懸殊差距後，更深刻體認到自己政府的無能與悲哀；邱文鸞則從臺灣實業會社的組織與功能，反思自己國家藉會社之名剝削民利的貪污問題。二人一方面見識到臺灣社會美好的理想表現，一方面卻也從這些進步表象的對照中，對中國的諸多問題有著更為透徹的反省與思考。

從拉岡的鏡像理論來探析這些中國旅人的對鏡歷程，可以有更進一步的發現。拉岡的「鏡像階段」概念直接藉自法國兒童心理學家瓦龍（H.Wallon），並以精神分析學的術語給予重新解釋。瓦龍發現，人類嬰兒在鏡像的活動與它們自身的活動之間看到了一種聯繫——鏡像即自我，嬰兒進入鏡像階段後，透過鏡像認識自己，認識自身的整體同一性。

拉岡則進一步將鏡子發展為一種象徵性的東西。鏡子在拉岡的理

28 謝鳴珂：《臺灣旅行記（三）》，頁105。

29 邱文鸞：《臺灣旅行記（一）》，頁3。

論中是一個隱喻，它可以指母親、他人。拉岡的鏡像階段發展出了一種自我與他人想像的二元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鏡子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他人也具有鏡子的功能。我們每個人往往藉由他人認識自己。³⁰

在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中，「臺灣」被當成一面鏡子，在反射對比的過程中，讓這些旅人們更深刻認識原本自以為熟悉的中國。

此種現象，在以官方考察為出遊目的的作品中更為明顯：

其他如果實、林投樹、畜產、水產暨其他各種林業，皆日趨發達。檢其統計之數，逐年增加。此固由於天然之美利，然非國民之毅力經營，計畫深遠，曷克臻此。回顧我國寶藏山積，而國民蟄伏於多年腐敗政治之下，隱忍苟活，不識時局之變遷、大勢之趨向，坐棄厚利，良可嘆也！³¹

張遵旭見臺灣物產豐厚、經濟發達，肯定國民之努力，再由臺灣的成功形象中，窺見自己國家徒擁先天優良條件、卻不知加以善用的弊病缺失。

藍適齊分析中國官方對臺灣的高度興趣有其實際目的存在：

而這些中國地方與中央的官員之所以變得對臺灣有興趣，主要是因為臺灣可以作為一面「借鏡」，以及作為外國的模型，讓福建乃至整個中華民族都可以從中學習不同於福建與中國的外國實體。這種描述一直為中國官員所堅定支持。³²

這種基於實際考量而引發的觀看興趣，也正說明了日治時期臺灣遊記中所多次出現的對鏡姿態。

在這些臺灣遊記中，中國旅人們嚴格遵守中國與臺灣（日本領土）的國家間界限，也因而將臺灣描述為一個位於中國外部界限之外的外

30 王國芳、郭本禹：《拉岡》（台北：生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137－143。

31 張遵旭：《臺灣遊記》，頁80。

32 藍適齊：〈超越民族想像－中國的臺灣論述與民族論述〉，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334。



國，卻也在這面被定義為「域外」的鏡子上，³³更清楚映照出一個待奮發振作的積弱中國。

不僅官方檔案如此，在私人出遊的遊記作品中，此種對鏡反思的歷程亦屢屢出現：

島內推銷之煙草，多由日本專賣局購入，大正十三年購入價額二百二十萬四千餘元，外國煙草雖間有商人購入，但為數甚微。在大正十三年，其購入總額僅五萬零六百餘元。夫以臺灣人口三百餘萬，買入外國煙草，祇此區區之數，以視吾國人口四萬萬，社會習慣，幾以煙草為日用所必需，除本國有少數製造外，餘悉為舶來品，年中漏卮，不知幾萬千萬。利權外溢，無法挽回，比之臺灣，真可恥也。³⁴

各業略分區域，同行麇集一處，窗口貨樣山積，五光十色動人概屬日本物產，絕少歐美舶來，此與中國通商大埠所見不同，殊可注意者也。³⁵

黃強與江亢虎分別注意到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情形，不論煙草或其他商品的輸入，臺灣皆以日本貨品為主，反觀中國，卻恰恰相反，以歐美舶來品為消費大宗，從臺灣對於本國貨物的強力支持，這些旅人已能敏感觀察出中國對外貿易的隱憂。

在他者的鏡像中，中國旅人驚見一個處處不如人的國家形象，哀傷沈痛之餘，也有更多強調見賢思齊的呼籲出現：

日政府於阿里山森林銳意經營，設集材工作社於阿里山，專事採伐。建築阿里山鐵道，以便運輸，設製材工場於嘉義郡城，以任

33 以臺灣為借鏡的觀點在官方文字中不斷被提起，除前文所提到的陳儀、顧維鈞外，李時霖又於自序中再次強調：「臺灣昔時視為荒外之地，方輿記載，往往略而不詳，自改隸於日，經其總督府宣力改革，草莽盡闢，物阜民殷，於是始引起國人之注意。……題曰臺灣考察報告，其中於衛生農林工商交通各端，雖不克一一考載，然所取材料，皆出於實地調查。國人倘因是而審知彼島之近狀，借鏡自鑑，捨短從長，努力建設，則考察團同仁之所願已遂，而是書之刊亦不虛矣。」參見李時霖：《臺灣考察報告·序》，頁392。再次出現的「借鏡自鑑」，也代表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對於台灣的觀感。

34 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52。

35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17。

改造。資力雄厚，經緯萬端。我國吉黑兩省，森林不亞臺灣，如能仿行，國之利也。³⁶（圖三）

余在中國內地每見各學校理化博物一科，耗費甚大，實用甚少，且物皆舶來，又並不完備。主張每城中心設一公共理化博物館，供各學校輪流應用。今臺灣趨勢，似已如此，此實小規模都市中各普通學校所亟應採納仿效者也。³⁷

吾粵海南黎民，為治瓊一大問題，向設撫黎局，因不得要領，遂無進步。余

以日人理蕃，與吾人撫黎，事同一律，且本互助與扶持弱者之心理，尤應於此事格外注意。³⁸

不論是林木資源的管理運用、學校博物館的設置抑或原住民問題的處理，日本對於台灣的統治經營方面，確有許多值得中國學習之處，也正因為如此，從進步的他者身上，旅人們不但更清楚瞭解了自己國家當時的處境與定位，也針對不同層面進一步提出實際建言與學習方向。

然而，中國旅人們所採取的對鏡觀看，卻也有其盲點存在。不到一個月的短暫停留，他們所見到的進步表象固然令人驚豔，但臺灣光鮮外



【圖三】：阿里山神木(江庸：《臺灣半月記》，未標明頁數)

36 江庸：《臺灣半月記》，頁20。

37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27。

38 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130。



表下所潛藏的問題卻不易被發現。在目前研究中，從歐洲中心論來談臺灣的現代／文明問題，已經累積可觀成果，臺灣的現代化並非從本地社會內部孕育出來的，乃是日本殖民體制建立過程中的強行轉嫁移植。對於日本的引入現代文明，陳芳明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所理解的現代性是為了更為有效開發島上的資源，以利其資本主義的再擴張。」³⁹

游勝冠也洞穿殖民者所帶來的是看似進步的假象，故以「殖民進步主義」一詞去揭露日本統治者的意識型態根本根基於優越與低劣二元文化的對立關係上，指出殖民真正的目的在於支配與剝削，致使臺灣人成為「從屬的主體」。⁴⁰終究無法享有文明進步帶來的幸福果實。

少數旅人注意到此一問題，⁴¹卻並不多見。大多數單純以考察及學習動機為出發點的中國旅人們，在遊記作品中所呈現的觀看態度，依然僅侷限於從他者（台灣）身上映照本土（中國）、觀看自我，在一面倒的讚美聲浪與自我檢討過程中，同時忽略了他者的主體性與完整性，儘管旅行時間差距相隔20多年，這些臺灣遊記作品，卻還是不斷呈現出相似的主題與反覆書寫的高度同質性。

（二）聯想的觀看

People leave home and return, enacting differently centered worlds, interconnected cosmopolitanisms.⁴²

我想回國，「首度認識這個地方」。⁴³

人離家，返回，帶動不同中心的世界，彼此相連的都會文化。透過他者的鏡像，在跨越邊界的過程中，旅人由他者身上窺見另一個陌生的

39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頁47－48。

40 游勝冠：《殖民進步主義與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文化抗爭》（新竹：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0年），頁7。

41 例如江亢虎便注意到日本政府對臺灣人民教育的不平等問題，參見江亢虎：《臺游追記》，頁50。此部份本文將於下一章節再進行分析論述。

42 Clifford, James. *Routes :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 Harvard UP, 1997. p27 - 28.

43 Brink, Andre. *Reinventing the Continent*. Cambridge : Zoland, 1998, p237. 轉引自廖炳惠：《另類現代情》，（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10。

自我與本土，也下一次的返家伴隨著重新認識的歷程。

在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中，除了看見他們企圖由鏡像反射中更深入探析自己國家之外，也可以發現，這些旅行者慣常以既有文化經驗與遊歷地點相比較，在陌生異地中突顯出另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例如黃強在參觀赤崁樓途中，便發現：

因樓在一小巷之內，離大街數十丈，余輩往遊時，大街闢為馬路，故在巷口停車，兩旁店戶，參差不齊，滿塗瓦礫，恍如廣州拆街築路時之遺物。⁴⁴

陌生異地的街道景象，卻讓他有時空跳躍的錯覺，重見當時廣州拆街築路的過往景象。⁴⁵

其次，將台灣景觀與中國圖象交互相映之例，在這些遊記作品中亦隨處可見：

四日早餐後，趁九時二十分急行車南下，車票購至台南……出入于無數山峒中，見其山間民居，頗似閩粵交界各地狀況。⁴⁶

由此（基隆）往全台首都之台北市……沿途所見鄉村風景，農家裝束，與漳泉間完全無二。⁴⁷

黃強所見之臺灣中南部景色以及江亢虎所描述之北臺灣景觀，同樣皆以閩粵地區為對照，形成另一種觀看他者的不同姿態。（圖四、五）旅遊的情感結構所引發的反應之一，便是在異地之中發現似曾相識的共鳴（resonance），在遠離家園之他處，找到本身熟悉或在無意識中彷彿早已見過（deja vu）的詭異情境（uncanny）。⁴⁸相似的情感反應不斷出現在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中，臺灣／中國的對比聯想多次出現，成為中國旅人書寫異地的慣用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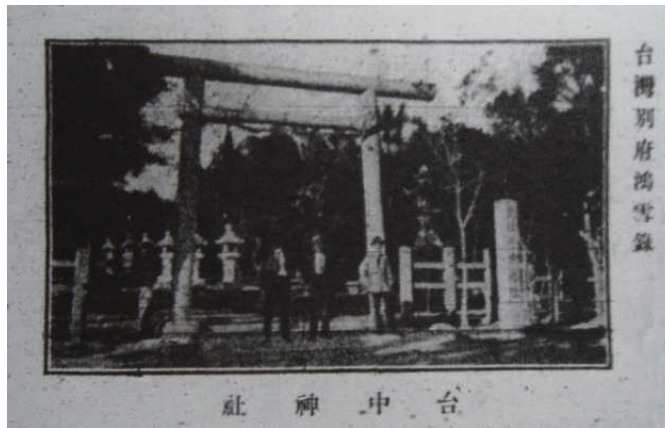
44 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80-81。

45 黃強常於旅行臺灣過程中聯想到相似的中國景觀，例如當他參觀新竹產業共進會時，亦與台南之遊的反應相似：「（農工館）有假設茶園，其布置如柑園相倣髣，惟添置二三採茶女模型，活動如生，吾人步行其側，儼如遊行杭州龍井途中」，記憶中的杭州圖象再次出現。參見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108。

46 同上註，頁66。

47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7。

48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175期（2002年3月），頁88。



【圖四、五】：黃強所見臺灣各地景色(《臺灣別府鴻雪錄》，頁13、68)

即便在政治上已被劃分為「域外」，對這些中國旅人而言，臺灣與其他異國依然有著不同的特殊性。因此，除了是借鏡學習的對象外，不論在地理環境或文化表現上，與皆有其關連性存在。因此，以熟悉的本土（中國）作為認識陌生他者（台灣）的出發點，也成為這些中國旅人所選擇的參照模式，透過交互對看，在陌生異地裡尋找另一個熟悉的本土（中國）意象。

在旅行過程中，旅遊主體總是不斷對客體（他者）進行凝視（gaze），而凝視不是旅遊者個別行為那麼簡單，社會、群體與歷史時

期不同，凝視的內容也隨之改變。⁴⁹

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日治時期的中國旅人往往背負著某種固定的責任使命而出遊，從上一小節所揭示的沈痛呼籲與深切反省，不難發現，透過臺灣所映照出的中國形象，其實是極為晦澀灰暗的。在多數集中於經濟層面的焦點凝視中，曾經創辦三所女學傳習所的江亢虎，於參訪高雄女中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對比參照，便顯得十分難得：

學生五百餘人，日本人台人各半，年齡平均十六歲，均四年畢業，體格健美，妝束樸雅，制服為白衣黑褲，輩脛坦露，胸部豐盈，一矯從前閨秀嬌小玲瓏之習尚。是日為大掃除日，師生均親執箕帚，幪頭跣足，操作如農家婦，可敬亦可愛也。余此次歷遊西南各省，見粵桂閩中下社會女子，無一不能以勞力自維生計，誦少陵「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之句，為之神旺。⁵⁰

江亢虎將健美勞動的女子師生與粵桂閩中下社會女子作一聯想，進而肯定這種健康的生活教育與女子生產力著實「可敬可愛」，顛覆傳統閨秀嬌小玲瓏之審美印象，在讚許他者的描述中也一方面肯定了自己國家婦女的優點。在參觀高雄女中之前，江亢虎已參觀過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校，於文中亦提及女子教育的身體觀：

余親見諸女生體操，四肢皆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可與歐美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秀，大不同矣，此非圖尚美觀，實民族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也。⁵¹

透過其所觀看健康的臺灣女性形象，點出中國內地閨秀的不同，進而強調女子體格與人種興亡、民族強弱之關聯。即便關注焦點不同於其

49 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 1990, p1.轉引自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6。

50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74 - 75。

51 同上註，頁22 - 23。



他中國旅人，但江亢虎所念茲在茲的，卻仍是揮之不去的國家責任。⁵²（圖六）遊記不只是記載個人旅遊行程或經歷，也呈顯作者對選擇旅遊見聞的材料、及組構有所反省。而遊記研究的重點多放在空間的疏離與移動，



【圖六】：江亢虎所見臺灣高等女學生（《台灣追記》，頁22）

探究敘事者的文化體性、歷史意識、批判距離等面向上的變動與多元位置，藉此呈現旅行事件及其過程的見聞與衝擊。為瞭解遊記文本的內在意涵，則須關注於敘事者的修辭、背景、職業、權力、資源及其限制，才不致於將文化與歷史的差異性抹煞。⁵³不同的旅行動機、旅行背景，自然會導致遊記的差異性存在，在日治時期不同身分的旅人作品中，卻可以看見相似的聯想與對比模式，這種凝視的姿態與角度，也就更顯得獨特了。

透過他者與自我的交相對照，日治時期的臺灣遊記，除了呈現出當時的臺灣社會樣貌外，也在旅人不斷的省思過程中，映照出一個令人更為焦慮不安的中國圖象；在他者的鏡像反射中，中國旅人們乍見陌生的本土與自我，卻又在遭遇陌生他者的同時，召喚記憶裡熟悉的景觀印象加以參照比較。在探析他者與反思本土的不停擺盪中，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交織出一種更為複雜的內在觀照。

52 這正涉及了傅柯所聲稱的統制（governmentality）的行使與運用，因為不論是就種族或國家生存的角度而言，「族力」或「國力」的建構最終所倚恃的就是身體的存在和其強弱的差別。在這種考量下，各種的身體操控機制，如儀禮教化、軍事訓練、流行病和公共衛生控制、人口統計、以及知識的普遍傳布等，競相被用來作為維持或提升族力與國力的輔助手段。這種試圖將身體開發成為國族生存的基礎條件的做法，是近代民族國家普遍在進行的工作。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身體的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頁41。

53 廖炳惠：《另類現代情》，（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12。

四、轉化生成——再次對鏡的隱喻關係

旅行過程中，常常是一種自我和他人再現的心理機制，比較、參考與對照別人的文化社會而顯現出人我之差別。從這些臺灣遊記的對鏡過程中，可以得知中國的形象，在另一個地方時空的迴映鏡景中顯得特別清楚且突兀。

發現本土與其他地區的差異後，旅人的心理機制會將外面的景觀以及引發的情緒變化以書寫的方式顯現內心裡的人我差異，這就是Writing and Difference。而在差異的比較過程之中，就會產生對本土政治、經濟、社會種種文化現象有著批評的距離、不同的觀點，也就是文化批判的位置，了解到優越感、自我中心、封閉性乃是閉塞無知的結果。所以旅行會發展出比較國際觀（comparative cosmopolitanism），透過都會間的比較會發現自己的不足或可笑的缺點。⁵⁴

在上一小節的探討中，可以發現，中國旅人們從反射鏡像中觀看中國，從自我與他者的差異中，進行種種檢討與反思的歷程。然而，在文化與種族所牽涉出的認知歸屬，卻使得這種一再反覆出現的對鏡過程除了批判之外，還摻雜了更多難解的糾葛關係。

（一）未解的優越感

福建與臺灣祇隔一衣帶水，此則土匪如毛，荊棘載途，彼則安居樂業，道不拾遺。且臺灣亦吾舊治也，往者為海盜叢雜之所，自被日本人佔領後，乃逐漸消滅，轉成樂土。噫歎，真日本人武力可畏哉。毋亦政治修明，實業發展，人皆豐衣足食，循規蹈矩，無須鋌而走險耳。語云：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此之謂也。⁵⁵

考察臺灣過去隸我國時，生番襲劫，地方紛亂，自日本銳意經

54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頁89－90。

55 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10－11。



營臺灣後，一面征服生番，一面注意鄉村警察，使農村治安安全，農作物得充分的保護力量，此次考察所及各地，非特並無匪氛，抑且盜竊絕跡，直所謂「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故鄉村生活，祇覺其舒適優美，農民致力於生產，宜其愉快也。⁵⁶

儘管在大多數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中，已經大力讚揚日本經營臺灣的成功，並以「道不拾遺，夜不閉戶」⁵⁷之太平盛世景況喻之，也大力批判了中國的諸多缺失，然而，在對鏡歷程中，旅人們始終揮之不去的自我優越感與中心／邊陲的固有觀念卻依然深植其中，未曾因他者的碰觸衝擊而為之鬆動。

這些旅人們一方面於遊記肯定臺灣各方面的成長進步，卻也一方面表現出始終不變的傳統認知：

余亦以足跡幾徧天下，而生平未抵此歷史上一名島，亟欲一觀野番初民生活，荷蘭殖民遺規，延平王開拓之功，清政府經營之迹，及四十年日本化之現狀，於是台游之念以決。⁵⁸

俾國人知蕞爾小島臺灣中，彈丸之新竹州，不過略行整理，便有如許生產，速行覺悟，將內戰設法消滅，而從事於生利事業也。⁵⁹

午餐後，偕友步通衢；見市道宏敞，車轍縱橫，商業亦頗繁盛。憶乙未之役，臺島始改隸日本；不過二十年，慘淡經營，卒成都會。海外荒陬尚能如是，況內地乎！⁶⁰

「蕞爾小島」、「彈丸之地」、「海外荒陬」……等形容，說明了

56 鍾幹丞：《臺灣考察報告·考察臺灣農村經濟之感想》，頁480。

57 黃強在作品中有更具體的事實描述：「余等所乘之車，為二等客車，座位為梳化椅，兩側對向，中為通路，甚整潔。開城丸買辦周君坐余之旁，以手帕滿包紙幣，幣多帕細，四角打結，未能包沒。余詢其銀錢如此露眼，不畏摸竊乎？周言我在開城丸任買辦多年，船抵雞籠，例停四日，我必往台北居住，俟開船之日始返船，向來在船所收得之款項，必如此攜赴台北，從未失落，蓋臺灣為一道不拾遺之地，縱在車中遺失，亦可原璧歸趙云。」，友人即便身攜鉅款乘車，卻仍不用擔心治安問題，著實令黃強大為驚訝。參見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10-11。

58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2。

59 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104。

60 謝鳴珂：《臺灣旅行記（三）》，頁84。

中國旅人們對臺灣的認知定位。江亢虎甚至在旅遊之前仍想像在此趟臺灣之行中「一觀野番初民生活」，這種充滿異文化想像的預期心理，也說明了中國旅人們的觀看姿態。

即使在日本統治經營之下，當時的臺灣已非蠻夷落後之地，然而，中國旅人們卻屢屢在肯定臺灣之餘，再次強調中國之先天條件優勢，意謂著只須勵精圖治，假以時日，地大物博之雄偉中國必然更有可觀之處。

一體兩面的矛盾情緒在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中多次出現，旅人們一方面承認臺灣的優點，一方面卻又忍不住回溯過往歷史，強調自我中心位置的優越性。改頭換面、進步神速的臺灣表現固佳，但依然無法改變其先天條件上的邊陲定位，擁有無盡自然寶藏的中國，欠缺的只是人為經營的努力，其優越的中心地位並不會因而動搖。

這種潛藏的自我優越感，在將臺灣與海南島的對照過程中更為明顯：

余以臺灣、海南，素有吾國兩目之稱，論其氣候土質地勢面積，則海南尤勝於臺灣（海南可種樹膠椰子，而臺灣雖能種，但成績劣下，實氣候不宜也），今臺灣已非吾有，譬如一人焉，眇目尚可行，若成為瞽者，則變為廢人矣。臺灣研究所之組織，於發展海南之實業，大可做行。爰將梗概一篇，備錄于后，關於瓊島開發之事業，其亦知所取法乎。⁶¹

亞里山原為蕃人所佔，毫無出息，今則變為臺灣之寶庫，年中產額逾二百萬，返念吾國之海南，如昌江之莪瀐嶺、玉道村、感恩之近溪莪……等處，……因海南孤懸海中，風威甚烈，故所產樹木，其抵抗力最為強大。攷其緻紋細密與性質耐久，實不讓臺灣所產。⁶²

61 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144 - 145。

62 同上註，頁101 - 102。



論臺灣之地理條件，僅與另一邊陲小島——海南島相似，甚至更為劣下。比之臺灣，海南島所產樹木品質亦優，還可種植樹膠椰子，先天發展條件更勝於臺灣。臺灣的繁榮進步固然值得效法學習，卻無法改變其諸多不如中國的先天劣勢，更何況，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臺灣頂多只能暫與同屬邊陲的海南島相提並論。

這種「中心／邊陲」的認知模式，與中國根深蒂固的「天朝型世界觀」有著微妙的關連。在中國傳統以來的世界觀裡，世界是以中土這個區域為其中心，向外輻射開展出去，以同心圓的形式，一圈一圈地展開。由政治上說，是因此而形成朝貢關係，周邊四裔四荒，一圈圈向內聚攏，向中心朝貢。其他方國，乃是夷狄戎蠻或四裔、九服、殊方、異域、四荒，稱謂上便顯示了它們臣服、隸屬、邊緣、異常、特殊的性質。⁶³

臺灣雖曾被納入中國版圖中，但其隸屬與邊緣的性質卻始終未曾改變，即使已被割讓給日本，但中國旅人們在接觸的過程中，往往還是不自覺地流露出此種認知心理。

再以邱文鸞與劉範徵參觀臺北測候所之心得為例：

地動儀，中國首先發明，特不能進步改良耳。吾國開化最早，學術亦最先發明；惟後人偏於文學尋章摘句而不暇考究格致，以讓外人之先我，是則可惜耳。⁶⁴

又繪有一地震機圖懸於壁上，為吾國漢張衡所發明者，但無今日之精確耳；然其原理，固發明自我國也。惟後人不日事研究、精益求精，各種科學俱讓他人進步耳。⁶⁵

兩人見日本製作之地震機，不約而同皆聯想到張衡所發明的候風地動儀，他們雖已承認中國近代科學不如其他先進國家的事實，但卻依然

63 龔鵬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71。

64 邱文鸞：《臺灣旅行記（一）》，頁23。

65 劉範徵：《臺灣旅行記（二）》，頁69-70。

沈湎於「吾國開化最早，學術亦最先發明」的歷史光輝中。江亢虎於彰化演講時，更以「東方文化復興」為講題，強調文化復興之重要性——非尊重保存固有文化，不足以提起民族之自信心。⁶⁶不論是對過往科學文明或傳統文化的堅持，都象徵了在旅行的對鏡過程中，中國旅人們所固守的認知價值。

由地理位置的邊陲定位到歷史文化的強調與堅持，在以臺灣為對鏡的參照過程中，還是可以發現中國旅人對中國的自我觀照依然有其固著不變的部分存在。即使在旅行過程中，他者鏡像所帶來的諸多衝擊改變了多項認知，但此部分卻仍然繼續堅固地以不同方式潛藏於各篇遊記作品中。

（二）想像的家國

1907年，著名的中國思想家梁啟超與臺灣抗日政治運動領導人林獻堂在日本巧遇。由於兩人各講方言無法溝通，必須透過翻譯，但林獻堂迫切求得解決之道，情態甚急，故改為筆談。梁啟超落筆即寫道：「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夕之遇，誠非偶然。」當林獻堂則向梁啟超請教關於臺灣人對抗日本殖民政權的意見，梁啟超回答：「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臺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供無謂之犧牲。」⁶⁷

顯然，在梁啟超的眼中，臺灣尚未被視為在當時或可預見的將來，中國所欲或所應關心的對象，臺灣人最好靠自己的力量來反抗壓迫。

梁啟超這種「本是同根」的解讀關係，在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遊記作品中也經常出現：

鄙人與諸君本為同胞弟兄，嗣因吾父母逼於貧弱，無力支撐，不

66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57。

67 參見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5年），頁72-73、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台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年，初版），頁24-40、黃得時：〈梁任公遊台考〉，《臺灣文獻》16卷3期（1965年9月），頁6-7。



得已將吾兄弟托付於吾伯叔之手代謀撫育，吾父母之苦衷當為吾兄弟所共諒也。綜觀吾伯叔對於吾兄弟之籌畫，有極滿意者，有極不滿意者。⁶⁸

嘉義遊客，歐美人甚多，中國人甚少，而中國特派官吏至此者，割台後此為第一次，故紳民均異常感動歡迎之意，出於至誠。……同胞無限感，盡在不言中，悲夫此言。⁶⁹

施景琛將中國百姓與臺灣人民的關係視為同胞弟兄，而將中國割讓臺灣給日本的喻之為「托付於吾伯叔之手代謀撫育」；汪洋也提及中國官員在台灣所受到之熱烈歡迎，是基於本是同胞的至誠情感。

許多將臺灣人描述為同胞的敘事，使用家作為類比，以進一步定義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的關係。臺灣的人民被認為是「三十多年前放棄了底姊弟」，⁷⁰蕉農的比喻更與施景琛的觀點頗為相似：「彷彿是父母因為一時窮債的迫逼，把老二賣給別姓」。⁷¹

顯然，基於血緣基礎，臺灣人被描述為與中國人有著密切關係，因此，面對國土淪喪的悲劇，中國旅人多半表現出類似的痛心：

嗣登舊砲台，先入一門，滿清時代之水雷營也，門額書保固東瀛四字，今之淡水陸軍演習廠舍在焉。登山即砲台，門額書北門鎖鑰四字，光緒十二年季春巡撫劉銘傳書，砲台建築猶昔，風景不殊，滿目有河山之感矣。⁷²

其最足動人傷感者，則砲壘橫額北門鎖鑰四字是也。查該橫額係

68 施景琛：《鯤瀛日記》，頁50-51。

69 汪洋：《台灣視察報告書·台游日記》，頁183。

70 許地山：〈許序〉，山川均著、蕉農譯：《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收錄於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初版），頁28。「臺灣割讓給日本已經三十多年了，我們住在中國本部底人注意臺灣同胞底生活恐怕很少，這個緣故多半是因為關於台灣事件底論文，報章雜誌罕有記錄，所以一般人無從知道他們最近的景況。加之中國本部的事情太多，許多人雖知道，卻沒得工夫去注意他們，間或談到臺灣同胞底生活，只是付之一嘆。中國現在的光景，自顧還有些來不及，何況能夠顧到三十多年前放棄了底姊妹們？」

71 蕉農：〈譯者自序〉，山川均著、蕉農譯：《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收錄於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頁29。（1930年1月28日蕉農識於日本京都）

72 汪洋：《台灣視察報告書·台游日記》，頁173。

光緒十二年季春巡撫劉銘傳所立，乃曾幾何時而門戶大開，鎖鑰大啟，外人入室，使人有舉目河山之慨矣。⁷³

汪洋（1927）與黃強（1916）遊淡水的時間相隔了11年，離甲午割台（1895）已有二、三十年之久，但面對劉銘傳所書「北門鎖鑰」四字，兩人還是興起了同樣的河山之感。

相似的沈痛感受在這些作品中一再出現：

樓上懸有漢文大清國讓渡臺灣全島於日本條約原文；外人視之以為莫大之光榮，吾人見之不覺潸然涕出也！樓下陳列遺額、古匾多方，及殘缺之虎旗、舉人報單及各種我國舊有物品，稍有知識者見之，能無痛心！⁷⁴

此次車抵臺南因與預定時間稍有變更，故地方官未及派人引導。余等雇車到公園遊覽。池臺竹木，結構宜人，樹林陰蔭，頗饒雅趣。聞設備經費凡十七萬元。當吾民國元年始著手布置，預計明年三月全部竣工。由此乘車，夾道多半為中國舊式市街，人口多係中國遺民，門外對聯尚有「國恩家慶」、「福」、「喜」等字，而國旗則盡改為旭日矣，可痛也！⁷⁵

旅途中所接觸的景象，一一提醒著旅人們國土淪喪的歷史悲劇。⁷⁶然而，這種河山之感，所表現出的情感雖極為沈重，但焦點仍在對中國國勢積弱的感嘆與檢討。相對而言，對臺灣所抱持的觀感卻僅止於一種對土地損失的遺憾與惋惜。⁷⁷

少數中國旅人在跳脫了浮泛的嘆息後，關注到在臺灣進步表象下所

73 龍川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頁62 - 63。

74 施景琛：《鯤瀛日記》，頁75 - 76。

75 張遵旭：《臺灣遊記》，頁89。

76 就連宗教界人士太虛大師在讀完鹿港詩人洪棄生的作品後，也為其故國之思感嘆不已，並作詩記之：「珠碎南崖，槎浮東海。變入滄桑，注破冬青之引，迸來哀憤，幻成春豔之歌。聞夏聲而如往，知漢澤之猶存。爰和鶴唳用達鶯鳴。」參見太虛大師：《東瀛采真錄》，頁59。

77 江庸亦抱持類似觀感，他認為臺灣「適於種植稻蔗，及樟腦之富，寰宇無比」在日人三十年經營之下，「現在歲入達一億二千餘萬」，「如此山河，一戰而棄，可歎也」，純粹由經濟效益來評估割台一事，參見江庸：《臺灣半月記》，頁2。



承受的被殖民悲哀：

然日人對於臺民雖有教育，而在社會至高不過一中等位置，至政界更無立足之餘地。此亦日人限制臺民之一例也。⁷⁸

臺灣自割讓後，物質文明之發展，生命財產之安全，皆遠勝前清，惟有三事，最受限制。一、政治活動，一、言論自由，一、專利營業，此三事皆戰勝者之特權而被征服人民所不許參加享用者也。⁷⁹

除了光鮮亮麗的現代化表象外，邱文鸞注意到臺灣人民在教育層面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江亢虎則指出台灣人民在政治、言論、營業等各方面被剝奪的自由，二者皆直指出被殖民者的無奈與悲哀。相較於大多數以同胞相稱，卻未曾發現臺灣人民悲哀的中國旅人而言，二者的觀察可說是深刻許多。

多位旅人們在遊記中提到自己在台灣所受到的熱切歡迎：

蓋自割臺後，內地人與臺灣人幾斷絕關係。中國固未嘗特派官員來此慰問視察，即私人來此游歷者亦甚罕。故此次予等到此，傳聞各地紳民異常感動。予深盼政府日後時加注意，私人方面則宜組織團體，時來視察，彼此借鑑，獲益定非淺解。⁸⁰

到台以來，遊蹤所及，均蒙華僑及日台官紳歡迎招待，有演說會、有座談會、有茶會、有宴會，每處皆然，真記不勝記矣。⁸¹

78 邱文鸞：《臺灣旅行記（一）》，頁3。

79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39-40。

80 張遵旭：《臺灣遊記》，頁87-88。

81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75。

基於漢民族意識⁸²的情感基礎，中國旅人與官員在台灣所受的禮遇與歡迎自是可想而知。⁸³然而，在熱烈歡迎之餘，江亢虎與張遵旭所陳述的事實與觀感卻也更值得眾人省思：

割讓以後，台人久不見祖國使節，第一任總領事履新，循視各埠，有山谷老民，扶杖匍匐，遠道來觀，初見領事西裝，疑為非是，嗣詢知確為華人，乃大聲呼籲，若曰：台人苦壓迫久矣，今何幸復見漢官威儀，幸為我輩伸冤。領事瞠目，不知所對，蓋鄉氓老死不出，不識漢文，亦不通日語，固不知割讓為何事，領事為何官也。⁸⁴

飯後到阿緱廳表謝盛意，乃到停車場，見本地人源源而來，環視予等，互相稱道，似以中國人到此地，甚為罕見。默揣其意，又似於吾等有無窮之希望也。⁸⁵

中國旅人們感受到台灣人民熱切的民族情感，⁸⁶卻又對於臺灣人民

82 在日據時期列為機密的《警察沿革誌》對中國的漢民族意識有進一步說法，並在《臺灣社會運動史》的部分序言中特別指出：「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起源乃繫於他們原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本來漢民族經常都在誇耀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牢不可破的。臺灣人固然是屬於這漢民族的系統，改隸雖然已經過了四十餘年，但是現在還保持著以往的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意識似乎不易擺脫，蓋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臺灣，僅一水之隔，且交通往來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臺灣人的觀念，平素視之為父祖墳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擺脫，這是難以否認的事實。」《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頁1-2，1939年，綠蔭書房復刻，1986年。中譯摘自於正宏譯：《日本人眼中的臺灣抗日運動》，見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初版），頁14。

83 江亢虎在台灣雖受到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的熱切歡迎，卻也曾在8月29日彰化演講會場上受到左傾分子的抗議。當晚講題為「東方文化復興」，遊記中江氏極有風度地邀請反對者上台發表演論，認為「余在歐美屢見過激黨人搗亂會場事其方法如出一轍，若制止之，則立起暴動，而借作宣傳，反不如聽其自由發言自由退出之為得也。」江亢虎：《臺游追記》，頁58。實際上江亢虎所述與事實並不相符，楊逵當時也在場，對於江亢虎提出「使用白話文會降低文學水準、毀滅文學的最高目的」一說頗不以為然，在楊逵的記錄中，當異議份子上台反駁時，江亢虎卻立即制止曰：「這不是意見發表大會」。楊逵：〈評江博士之演講〉，《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年初版），頁104。

江亢虎為復興傳統文化而提倡文言文、貶低白話文的說法，也惹來賴和、張深切、楊守愚……等諸多臺灣文人的嘲諷與批評，張深切甚至於《臺灣新民報》上發表〈驅逐江亢虎出境〉一文，以表達對江氏的不滿。彰化演講事件相關經過參見林耀椿：〈江亢虎在台灣〉，《台北文獻直字》149期（2004年9月），頁198-200、翁聖峰：〈江亢虎遊台爭議與《台游追記》書寫〉，頁39-49。

84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14。

85 張遵旭：《臺灣遊記》，頁87。

86 這種民族情感也正是日本政府所顧忌的部分，江亢虎曾在遊記中提到：「余擬題文化與民族之關係，會館某君告余，民族二字，最為日本人所厭聞，去年全台華僑代表大會，有舉民族教育為論題者，在場警察禁止其發言，全場中標語有寫民族主義者，警察命以白紙貼去民族二字」參見江亢虎：《臺游追記》，頁70-72。



所賦予的希望與請求無能為力。誠如梁啟超所言，日治時期的中國政府，短時間內並無能力為臺灣爭取自由，在「本是同根生」的情感連結與政治版圖割裂的矛盾情緒中，面對疆界之外的臺灣，中國旅人們縱有再多的同族情感，終究也只能置身於外，冷眼旁觀。

五、結語 —— 對照記

阿里山為日本帝國第一高山，其主峰即新高山，比富士尤高。⁸⁷

在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中，臺灣的名勝阿里山已被稱為「日本帝國第一高山」，從疆界的劃分與認知上，可以清楚看見，對當時的中國旅人而言，「臺灣」，已是一個被割離的域外空間。

旅遊同時也是個鏡像，在映照出自己的時候才可能映照出其他。⁸⁸

藉由對鏡過程，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呈現出多元的重層觀照。在以臺灣作為借鏡的考察遊記中，進步、現代化的鏡像反映出另一個衰敗的中國圖象，使旅人得以更清楚認知本土（中國），進行自我反思；作者們在陌生異地尋找熟悉景象的對比聯想，也在探析他者（台灣）與反思本土（中國）的不停擺盪中，交織出一種更為複雜的內在觀照。

「中心／邊陲」的參照模式以及民族意識的摻雜，使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作品在詮釋中國／臺灣的關係時，有著更深層的對鏡隱喻。臺灣的經濟成長並未真正衝擊旅人們的固有定位，不自覺的中心優越感與邊緣認知依然出現於大部分的作品中，成為遊記作品的另一種局限；除了反覆出現的山河之感外，少數中國旅人更敏銳點出臺灣光鮮表

87 江亢虎：《臺游追記》，頁61。

88 南方朔：〈中國旅行記號學〉，《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3年2月19日）。

象下的殖民地悲哀，表達出更深刻的民族情感與關懷。

日治時期中國旅人的臺灣遊記不但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更真實反映出臺灣／中國長久以來糾結的情感關係。在對鏡過程中，自我與他者的不斷進行種種對話與觀看，藉由姿態角度的調整與轉換，也由此建構出更豐富多元的文本意涵。